



上海出版基金项目
Shanghai Publishing Funds

李君如著作集

01

观念更新论

民主：并非虚幻的存在

学思录



世纪出版



上海出版基金项目
Shanghai Publishing House Project

李君如著作集

01

观念更新论

民主：并非虚幻的存在

学思录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著作集出版得到
上海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峰学科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建设资助

前 言

利用丁酉年春节的假期,我把上海人民出版社9月底寄来的书稿清样校阅了一遍。尽管天天看稿子,看得头昏眼花、十分疲劳,但心情大好。这不仅是因为欠下的“债”终于可以偿还了,而且是因为这些书稿有的是近年写的,有的是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写的,但基本观点在今天还是都站住了,心中感到比较欣慰。

当然,也有遗憾。主要是好几本书特别是近年的书中,内容仍有重复(原来我以为有重复的书都没有编入这套著作集,但没有想到编入的书中有些章节仍有重复)。

年初九(2月5日)我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王为松社长见面时,谈了我的这些感受,同时建议在全书前加一个“前言”,对这部书作一点说明。

在校阅这几百万字书稿的时候,我感慨万千,想到了许多往事,想到了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启迪过我、支持过我、帮助过我、指导过我的老师、亲人、朋友、领导和同事。与此同时,我更庆幸自己的理论生涯能够同中国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联系在一起。确实,是改革开放这个火热的时代,使我能够紧贴中国的社会现实,展开理性思维的翅膀,在理论工作的原野上耕耘、收获。作为在上海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上成长起来的理论工作者,我更要感恩上海,包括要感谢这次提出要编辑出

版我的著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读着这些旧作和新著,我想起了龚育之先生自问自答的一段十分精彩的话。他说,有人问我是什么“家”,我学的专业是化学,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在中宣部工作,研究过自然辩证法,“文革”后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因此我只能算是一个“杂家”。由此联系到本人,我也问自己:我算什么?当然,我称不上什么“家”,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者”——理论工作者。那么,我又问自己:我是什么学科什么专业的理论工作者呢?这就更难了。我在上海师范大学(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由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教育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上海体育学院这五所高校合并的上海师范大学)读的是政史系的课程,当时我爱好哲学,1973年在《解放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哲学方面的。“文革”后,我作为上海市松江县委党校的老师加入了上海哲学学会,并在那个时候投入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81年3月我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招考,1982年成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实习员,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照这么讲来,我应该算是一个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工作者啦?似乎是,但又不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大约在2013年,秘书说许多单位在邀请我去参加活动或讲课时希望提供一份简历,问专业方向怎么写,我说:“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为什么这样讲?这要从我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讲起。

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有几次比较大的转型。记得2011年4月我曾经在中央党校办的杂志《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上发表过一篇有趣的文章,题目叫做《维纳的〈控制论〉和我的毛泽东研究》,讲的是我们怎么开始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文章中写道:

从小就喜欢读书的我，脑海里老记着那些格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不懂意，等于啃书皮”。没有想到，当我成为一名专业的研究人员时，居然碰到了书越读越多，书皮越啃越多，直到连“啃书皮”都啃不下去的狼狈情况。

1984年，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有4个年头了。这4年里，我不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著作，还啃完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名著。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精神传达下来后，哲学所掀起了改革热潮。许多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同事，开始转向研究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我也动了心，找来了维纳的名著《控制论》，认真地“啃起了书皮”。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这不是我的研究方向。

当时，我是上海理论界都非常敬重的老所长周抗同志的助手。一天，我去他家汇报工作的时候，对他谈了我的思想和苦恼。

我说，现在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这“三论”很时髦，已经被大家看做是哲学研究的前沿，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都开始转向这一研究方向。但是，我认真地读了《控制论》，也了解了信息论、系统论以及更为前沿的耗散结构论、混沌论等新理论，我感到有一个大问题。

周抗同志是从延安抗大走出来的哲学家，以求实、正直而又体谅、关心年轻人著称。他说，在我这里，你有什么话都可以说出来。你发现了什么问题？

我说，维纳是个数学家，他的《控制论》尽管不难读，但是没有高等数学基础的人，是无法真正理解他的方法论的。我尽管是从

以数理化教学出名的重点中学松江二中毕业的,函数、微积分都学过,但只是一些基础性的知识,我在上海师范大学读的是政治历史系,全是文科知识。我如果转向研究“三论”,必须先补高等数学这一课,而这是基本不可能的。否则,充其量也只能是在哲学文章中加上一些“信息”“反馈”“系统”“熵”等新名词,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用“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等新话来点缀点缀。我感到,这样做实在谈不上是什么“研究”,也不可能出好的有自己独到见解的成果。

周抗同志说,你的话我理解。说实在的,这不怪你们。一些大家,在知识结构上大多是文理相通的。研究哲学的本来更应该文理都懂,但是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是文理分割的,学哲学的只会那么一点哲学知识,这些知识对于教教书够用了,对于搞研究是不够用的。你发现的问题,很重要;你能够毫无顾忌地说出来,也很好。

其实,我之所以对周抗同志讲,而不敢对别人讲,就是因为有顾忌。但是,在他那诚恳的态度和话语鼓励下,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说,《控制论》我至少读了3遍,边读边思考我今后的研究方向。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希望能够得到领导的支持。我注意到,维纳的《控制论》是在科技实践特别是“自动机”技术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我们最丰富的实践是什么?是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我们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应该从这样的实践中去研究、提炼和概括。所以我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我们的党史研究结合起来,以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为基础去研究我们的哲学。

周抗同志不等我说完,就说:“就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吧!我

同你一样,不反对别人去研究新东西,但自己研究的应该是自己能够研究的东西。我就希望有年轻人能跟我一起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我们一老一少一起来研究吧。”

我知道,周抗同志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和自己的独到见解,但他们老一辈人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最器重的是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我说,我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思路,不想仅仅局限在毛主席的那些哲学著作上,而是想研究我们党的全部历史经验,包括毛主席领导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经验。通过这样的研究,看一看贯穿在党的实践经验中的哲学思想是什么。想不到,周抗同志耐心地听完了我的想法后,兴奋地说:“我完全赞成你的思路。”

没过多长时间,所党委在充分听取大家意见的基础上,把哲学所的改革方案敲定下来了。其中让我特别高兴的是,专门成立了一个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后来,又任命我为研究室主任。这样,我就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的研究集中到“中国革命与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专业方向的研究上来。这是我的研究工作和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后来,我给研究生先后讲的《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等课程,就是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上形成讲稿的。这些讲稿后来加上《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形成“毛泽东研究三部曲”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一版再版又多次重印,并在1998年荣获第11届“中国图书奖”。

回想我的整个学术生涯,特别是在毛泽东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我常常同朋友们说,如果我当时赶时髦地去研究“老三论”“新

三论”，肯定是不自量力、一无所获，而我之所以能够在毛泽东研究中取得一定的成绩，又是因为认真地读了《控制论》。所以，当梁丽萍女士希望我能够为《读书·人生》栏目写一篇文章时，我脑子里就浮现出这件事。我给她发了一个短信，说：“题目是有一个，角度也与众不同，关键是看我有没有时间写。”现在，把这件“与众不同”的读书经历写出来，不想再写什么“体会”“感悟”之类的话语了。至于朋友们从中可以读出一些什么“体会”“感悟”，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交流。

在这篇文章中，我讲到自己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思路，“是想研究我们党的全部历史经验，包括毛主席领导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经验。通过这样的研究，看一看贯穿在党的实践经验中的哲学思想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当然是把毛泽东哲学思想放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背景下去研究，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来龙去脉。当时，我们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主任是蒋照义同志，他更是主张这样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我和他合写的《中国革命与〈矛盾论〉》就是这一研究思路的体现。这一研究思路，就是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来阐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中的基本观点是怎么形成和发展的。其实，过去我们许多学者都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并不是首创的，只不过比别人做得更系统一些而已。我当时和周抗同志谈这个问题时，谈的思路和这个思路还不完全一样。我说，我查了延安时期的报刊和著作等，发现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在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过，第一次公开发表是1951年和1952年，其中《实践论》是在苏联报刊上先发表的。既然在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过，那么它们怎么会产生理论影响呢？再一

查当年毛泽东公开发表的影响最大的著作,一篇是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当年还出了英文版),一篇是1938年10月发表的《论新阶段》,一篇是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还有一篇是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发表在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中,在海内外影响极大。我说,这些著作影响大,不仅是因为它们的内容重要,回答了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而且有极强的说服力。这种“说服力”是什么?就是逻辑,或者说是逻辑的力量。列宁说,马克思没有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毛泽东这些军事、政治著作中展现给我们的也是逻辑。正是这种逻辑力量说服甚至征服了当年在斗争中感到困惑的人们。这种“逻辑”即哲学思想。因此,我认为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要从《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中体现的活逻辑研究起,在这样的研究中既可以理解《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哲学著作,又可以获得比《实践论》《矛盾论》更丰富的思想。周抗同志当时非常高兴,特别是对我引用列宁的话来说明毛泽东那些军事政治著作中的“逻辑”,格外赞同。同时,他提醒我说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在抗大印发过,边说边找出了抗大油印本教材《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翻到第二章第十一节是《实践论》,又翻到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说这就是《矛盾论》的内容。他说我的发现是对的,这“两论”公开发表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但不能简单地说是延安没有发表过,严格地讲,新中国成立后是“重新发表”,要我警惕有的人在找种种借口否定毛泽东这“两论”。他又说,仔细研究《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毛泽东的军事政治著作中的活逻辑,更可以看出“两论”的价值,也更可以深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在他的指导下,

我在1989年第一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发表了《毛泽东的实践辩证法：〈论持久战〉再研究》。其基本观点后来写进了《毛泽东与近代中国》。周抗同志不仅指导我开展研究工作，还让我给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研究生讲课，并推荐我到上海师范大学给大学生讲毛泽东哲学思想。我还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为题，应邀到复旦大学等高校作过演讲，《人民日报（海外版）》当时还有过报道。我的《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就是在这样的讲授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在这样的研究中，我越来越体会到，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一定要把视野放开，要下功夫研究整个毛泽东思想内在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色彩，研究的规律是“中国革命规律”“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这样的“实践规律”。我们也不能离开丰富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来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

这样，我的研究工作出现了两个相互联系的方向：

一是，深入研究毛泽东分析中国社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揭示中国革命战争战略、制定统一战线政策、加强党的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以及文化建设等方方面面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记得我研究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的论文发表后，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告诉我，他们的副主任龚育之同志表扬了我。最重要的，是我完成了“毛泽东研究三部曲”，即《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这三部著作。记得龚育之同志读了《毛泽东与近代中国》后对我说：“你把近代以来中国的基本问题概括为‘救亡和发展’，既符合事实，又可以说明我们过去为什么要搞革命，今天为什么要搞建设和改革，非常重要。”没有想到的是，《毛泽

东与当代中国》出版不久就因为读者喜爱而再版和重印,还被评为“光明杯”图书奖;三部曲全部完成出版后,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评为第11届“中国图书奖”。我也因此从助理研究员被破格评聘为副研究员。记得在接受老院长张仲礼主持的高级职称评委会专家答辩时,大家对我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一些具有思辨色彩的观点和论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让我特别感动的是,“毛泽东研究三部曲”出版前,我的导师周抗同志不仅认真审阅每一部书稿,而且亲自执笔写序言。“三部曲”中有的观点和出版社审稿的同志的意见有所不同,我从福建打长途电话向他报告,他说:“出版社对书稿有不同意见,你可以把这部分内容去掉,但不能修改。这是你的研究成果,我搞了一辈子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都没有发现的问题你发现了,我在读你的书稿时已经查了你讲到的原著,你没有错,做学问不能轻易改变自己的研究成果。”“三部曲”中第三部著作出版前,他已经在华东医院住院治疗,读了书稿仍坚持要亲自写序言,让我心疼不已。与此同时,我还关注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和动态。有关文章发表后,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商量合作编译出版国外毛泽东研究成果。国内第一部“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就是这样面世的。

二是,关注我们身边的实践,用毛泽东的认识论特别是方法论研究我们所处时代的改革开放经验。其中,最突出的是研究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观念更新”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大踏步推进,而许多人的思想观念跟不上时代的变化,甚至出现了新观念刚形成就被旧观念同化的现象,还有一些人在改革大潮中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情况异常复杂。我以自己对实践中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注意到观念不仅是客体在主体头脑中的反映,是经验和理论

在人们头脑中的积淀,而且是“知”“情”“意”的结合和交融。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够被中国共产党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不仅在于毛泽东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主张,不仅在于毛泽东善于通过历史和实践对比使大家在情感上接受这些主张,而且在于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等形式把这些正确主张转化为全党的意志。许多人在改革开放中感到思想困惑或纠结,就是在理性上认为邓小平作出的改革开放决策是对的,但在情感上接受不了,有的还以强烈的意志维护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陈旧观点。因此,要形成改革开放的舆论氛围,也要从“知”“情”“意”的结合上去努力。特别是,当我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中的观念现象后,还发现人们的观念不是以单个观念的形式简单地存在的,而是各个观念相互联系以网络状存在的,我根据马克思关于“思想群”的论述,把这样一种观念结构称为“观念群”。根据这样的认识,我写了《观念更新论》,指出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要推进的“观念更新”是“观念群更新”,和毛泽东思想形成时同教条主义斗争时的情形一样,只更新一个观念而不更新与此相联系的其他观念,即使已被更新的观念,也会回潮或被没有更新的旧观念同化。与此同时,我认为核心问题是要突破对社会主义的僵化观念。这些研究成果当时我应邀在上海市委常委学习中心组讲过,在上海许多单位讲过,对于促进解放思想、推进上海的改革开放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当年我还是一名年仅30多岁的青年理论工作者,之所以能够在上海改革开放初期脱颖而出,获得这些研究成果,完全得益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记得时任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在市委小食堂请我吃饭时,我同他谈过这个心得体会。他肯定了我的这个研究心得。党的十三大后,中央有关部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全国理论工作者开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研究,当时我已经被调

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在常务副院长姚锡棠领导下组织一些专家承担了松江县县情调研的任务,我用的方法也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收获很大。也就是在这次国情调研中,我认识了当时主持全国国情调查工作的后来的“顶头上司”郑必坚同志。

国内政治风波发生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交给我一个任务,组织35岁以下青年理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加强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我起初考虑按照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组织教学培训。后来通过向年轻人调查,了解了他们的思想状况,调整了教学办班方案,组织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马克思一直讲到毛泽东、邓小平,效果非常好。后来,院党委要继续组织35岁到45岁的理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这两期培训班,我们不仅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发现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人才,这些同志后来都走上了领导岗位。而我自己也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要在“知”“情”“意”的结合上建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必须史论结合,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中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也是我日后的研究工作越来越突出思想史的重要原因。

收入本著作集第三、四、五卷的《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这三部著作,以及收入本著作集第一、二卷的著作《观念更新论》《民主:并非虚幻的存在》《学思录》《中国革命与〈矛盾论〉》,就是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时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获得的成果。这些成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努力在史论结合上下功夫,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发展历程。

1991年,中央有关部门部署各地学习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纲要》。上海市委研究室的同志找到我,说市委领导指示,上海学社会

主义理论主要学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市委常委中心组要带头学习。研究室的同志说：“你研究毛泽东思想，又关注改革开放中的现实问题，在辅导市委常委中心组学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观念更新理论时反映不错。希望你为市委常委中心组学习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再作辅导。”接到这个任务，我当即停下手头的研究工作，抓紧备课。中心组学习会上，我为市委常委中心组介绍了国内外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况，同时也讲了自己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点心得体会，包括对当时有争议的市场经济问题的看法。课讲完后，市委宣传部要我将其中阐述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讲，向全市宣传干部宣讲，讲稿压缩后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于1991年6月5日见报，题目是《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章发表后，报社和我就收到许多来电，有肯定的，也有质疑的。反响如此强烈，出乎我的预料。6月20日，我接到老市长汪道涵秘书的来电，说汪老要见我。6月22日，《解放日报》理论部主任将读者反映写成内参上报领导部门。之后，我接到来电，说已经退下来的市委老领导陈沂同志支持这篇文章，说：“李文我看过，写得很好，没有什么问题。”

同汪老见面促成我研究方向的又一次转变。我曾经写过一篇回忆这次见面的文章，收录在纪念汪老的文集《老先生》中，这篇文章是这本回忆录中为数不多的谈及理论工作的文章。可惜由于我几次搬家，一时找不到这本书了，只能从别人写的文章中抄录这次见面的情况：

同汪老见面是在市委办公楼一间小会客室里。李君如一行赶到时，汪老已等候在那里，手里拿着书在翻着。汪老慈祥的笑容、

平和的话语,使李君如紧张的心情放松许多。

汪道涵高度评价了李君如的文章,还亲切地询问他的经历和研究工作情况。李君如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工作情况和研究体会向汪老作了汇报。李君如说,自己多年来以毛泽东研究为主要方向,在研究工作中感到要搞清楚中国的社会变革历史,不仅要研究毛泽东,还要研究孙中山和邓小平。也正因为有毛泽东和孙中山研究的基础,对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能理解。汪道涵说,这个体会很好。汪老明确提出,希望李君如把研究方向转到邓小平理论研究上来。

汪道涵说:“现在,围绕改革开放出现一些不同的观点,就是因为对邓小平的思想研究不够。要研究毛泽东,更要研究邓小平,我想以你为主来开展研究,赞成你这样联系毛泽东来研究邓小平。研究邓小平,要回答‘左’‘右’两个方面对改革开放的质疑。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不是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中心问题是对市场经济要有正确看法。”接着,汪老还谈了研究方法等问题。

从此,汪道涵就经常通知李君如参加他的研究工作和活动,这段经历使李君如获益匪浅。

从上海市委中心组关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讲课,到汪老的谈话,实际上改变了李君如的整个学术生涯。那天从汪老那里出来后,李君如就到他的导师周抗那里汇报谈话情况。周抗赞同汪老的意见,要李君如转变研究方向,把重点放到邓小平理论研究上来。此后,李君如详细制定了一个邓小平理论研究的计划,并陆续就研究心得发表了一系列较有分量的文章。